

讖纬思想的“天意”和孟子思想的“仁义”： 朝鲜正史《三国史记》的双层思想结构

佐藤将之

摘要：依据观念史研究途径，关注思想多层结构的内容，试图阐明《三国史记》的政治思想特质。主要针对以下三个主题作探讨：《三国史记》的作者们（高丽史官和金富轼本人）通过何种概念和术语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三国史记》政治论述的两种主导思想，即讖纬思想和仁义思想；上述两种思想如何影响《三国史记》的文献构造及其阐述思想的方式。试图证实《三国史记》的论述内容是基于讖纬思想和仁义论的双层结构，而两种思想并存的事实可证实《三国史记》经过高丽王朝初期和金富轼时期这两阶段的编辑过程。金富轼在重新编纂现本《三国史记》之际，将原来以灾异等“天意”支配三国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转换成以某一个国君或朝臣是否有（违）“仁义”的角度，以此重述历史事件的成败。“仁义”这个德目在此不但被看作高丽统治层最需要实现的政治（和伦理）理想，更提升为支配自古以来整段朝鲜历史的法则。

关键词：《三国史记》；金富轼；孟子；仁义；高丽王朝；讖纬思想；朝鲜儒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22)06-0000-16

DOI：10.19946/j.issn.1006-2815.2022.06.017

本文承接笔者前文《朝鲜正史〈三国史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概念架构》的观点，主要依据观念史研究途径，关注其思想多层结构的内容，试图阐明《三国史记》政治思想的特质^①。

一、政治概念

本节为了预备本文整体的考察基础，将先探讨《三国史记》的作者（不论是高丽史官还是

收稿日期：2022-05-18

作者简介：佐藤将之，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东亚观念史、荀子等研究。

E-mail: msato@ntu.edu.tw

① 该文在2022年8月18日于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所举办的“孟子思想及其在历代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刊登于《科学·经济·社会》（2022年第4期，第81-109页）。

金富弼)经过何种概念和术语来了解国家政治的问题。换言之,我们的主要问题意识在于厘清《三国史记》作者如何理解现代人界定的所谓“政治体系”“权力关系”“分配资源和利益”等政治现象。整体而言,《三国史记》基于儒家世界观展开其历史叙述。那么,我们所要厘清的是,这种历史记载中三国政治事件是如何被撰写的?藉由儒家世界观来构成历史世界时,《三国史记》的编者们特别是以此为核心任务的金富弼,要向读者(高丽王朝后代的统治者们)提供何种教训和启示?

(一)与国家相关的概念

那么,本节先从《三国史记》中有哪些词汇表达现代所谓“国家”或“政治体系”的问题开始探讨。众所周知,《三国史记》基本上是对在朝鲜半岛曾经存在的三国兴亡之叙述,所以其政治术语非常丰富,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汉字常用的关于国家的词语,几乎全都能在《三国史记》中找到。

首先分析《三国史记》的“国”字。“国”字和其他字结合的用法如表1(先排除国名)。

表1 《三国史记》的“国”字用法汇总表

1. 本国	2. 他国	3. 我国	4. 贵国	5. 自国	6. 吾国	7. 尔国
8. 臣国	9. 上国	10. 君国	11. 属国	12. 邻国	13. 国家	14. 中国
15. 中华国	16. 三国	17. 海东三国	18. 外国	19. 日本国	20. 金官国	21. 诸国
22. 狄国	23. 宝露国	24. 九夷之国	25. 大宋国	26. 名义国	27. 远国	28. 父母之国
29. 君子之国	30. 万国	31. 强国	32. 旧国	33. 故国	34. 敌国	35. 名义国
36. 军国	37. 小国	38. 大国	39. 北国	40. 邦国	41. 本国人	42. 异国人
43. 国内	44. 国东	45. 国西	46. 国境	47. 国疆	48. 国界	49. 入国
50. 国归	51. 还国	52. 国王	53. 国主	54. 国相	55. 国戚	56. 国人
57. 国民	58. 国色	59. 国号	60. 国玺	61. 国帑	62. 国章	63. 国史
64. 国事	65. 国论	66. 国学	67. 国记	68. 国俗		

第1到42项的词语指涉当时的国家关系。这些词语表现出的思想特色就是:国家的序列以中国为核心,并且展延到周边国家的阶层结构。故此,这个世界由“万国”共同构成,而“中国”或“中华国”则处于中心地位。对三国来说,“中国”乃是“上国”“大国”“君国”(在金富弼时代,中国被称为“大宋国”^①)。其下为“海东三国”。在海东三国中,新罗更从唐室那里获得“君子之国”和“名义国”的封号。所以从《三国史记》视角来看,在以中华地区为正统王朝以外,新罗是序列最高的国家;再下则是“倭国(日本国)”“宝露国”等,属于海东三国的周边国家;最后是以“狄国”为中心的“九夷之国”。从中国的立场来看,中国以外这些周边国家都是“臣国”。当然,所谓“我国”“尔国”“自国”“他国”等用法,亦预设了本国与外国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存在于本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认同”(state identity)。

第43到48项的词语指涉国家领域。根据这些例子,中国的“国”字(“国”的口部原意是城堡)的用法,显示了从指涉都市国家转变为指涉领土国家的迹象。在《左传》和《孟子》中,“国”

^① 在《三国史记》中,“获罪于大国”“畏大国之讨”等表达方法指的“大国”并非指规模庞大或国力强盛的国家,而是专指以中华地区为中心的正统王朝。但是,到了高句丽时代,在新罗使节上奏高句丽王的发言中,却出现“高句丽大国”的讲法。至于在中国史书中,仍一律记作“高句丽小国”。

主要是指都市国家。要注意的是,《三国史记》的编者虽然引进了外国(即中国)的纪录手法,但他们仍针对三国的实际情况而使用汉文字。

第52到58项的词语指涉构成国家的主体。这些词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由哪些角色构成。在图1中,笔者列出了“国”字所涉及的各种国家成员。从中可见,这些用例反映《三国史记》政治世界由国君到人民的政治构造,特别《三国史记》对国王、国相、国人、国民^①皆有明确的定义,而这四种“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代表着《三国史记》叙述政治事件之主轴。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政治秩序应是《三国史记》著者(所谓“著者”,除了三国时期的史官——历史的实际记录者——之外,也包括编辑《旧三国史》的高丽时期的编纂者)和编者所思考的秩序,而不一定正确反映三国时期实际情况,包括构成国家和社会的成员,或者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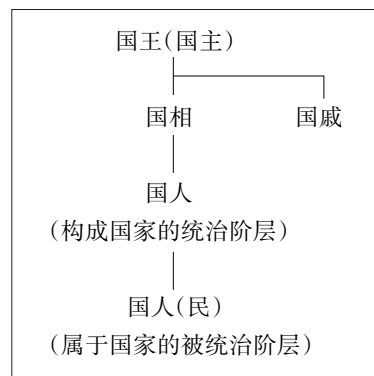


图1 由《三国史记》“国”字用法所见的国家构成

那么,在《三国史记》中,以何种词语来表达国家兴亡相关的现象呢?首先,国家的开始被称为“立国”或“开国”。《高句丽本纪》中的“开国称王”一语,意味着《三国史记》各层“记录”者认为国家并没有自然产生^②。在儒家思想中,国家是君主和人民二合为一的人群共同体,即所谓“夫百姓不可以无主”。《三国史记》的记载继承这样的叙述态度,并且构成其儒家论述成分。

扩展国家领域的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别国的人民自愿归依,一是以武力征伐其他地域。前者是“以国来降”,后者是“取其地为城邑”。新罗不但礼遇“以国来降”的君主,且会把他们的“国家”封为“食邑”以保证其实际的统治权^③。特别对《三国史记》的最终编者——金富轼——来说,最可期望的情况当然是前者,因为国君会吸引周边人民实际上是实践仁政的必然结果。

相反地,如果邻国穷兵黩武,则很可能会使本国被邻国“夺掠民口”或“降为属国”。从构成《三国史记》主要记录的三部《本纪》看到,三国对于邻国扩张领土的行为极其忧虑。因此,他们步步为营,以免“获罪于上国”而遭“大国之讨”。如能克服这种危险,而做到“国完民聚”,那么国家就可称为“谓莫与我敌”。由此可知,金富轼认为三国国君应该采取的态度是“畏大国之讨”和“亲仁善邻国”两种。

国家的灭亡通常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遭受“大国之讨”。但金富轼不认为国家遭受“大国之讨”一次就会灭亡,如《高句丽本纪》总论的论赞部分中有“当其上下和,众庶睦,虽大国不能以取之”。照金富轼看来,国家衰退的最大原因是“政事凌迟”,令作为国家根本的人民“乏于

① 在这四个词语当中,“国民”一词在《三国史记》中常被简化为“民”字。

② 申滢植亦注意到,在《三国史记》编者的观念中,君主(王)和国家是不可分开的。他指出:“所有的政治行为是从王开始的,同时亦归结于王本身的责任。《三国史记》的纪录告诉我们,在整个三国时代,社会现象和王的责任是无法区分的。”参见申滢植《三国史记研究》(首尔:一潮阁1981年版,第162页)。在申滢植看来,王和国家无法区别的原因,取决于金富轼的编辑态度——他根据儒家的国家概念,将《旧三国史》改编为具有一贯思想的《三国史记》。

③ 见《新罗本纪》“法兴王十九年”条。

食,困于役,因之以流亡”。换言之,不能做到“利国安民”的国家属于此类。这种国家被分类为无法推行“仁政”的国家,故金富轼认为,这种国家开始接近于灭亡的边缘。如果国家的衰败主要由国君本人所为造成的话,若国家存亡的危机状况一直出现,则将此国家从灭亡挽救的唯一办法似乎是更换此位国君。

耐人寻味的是,正如说“国之存亡,天命也”^①,一个国家要不要灭亡的关键,并非人事所能左右之想法,或多或少应该反映三国时代君民所共有的认识。相形之下,金富轼则坚信国家的存亡可以由某一个国君是否发挥他的“仁义”来决定^②。因此,在《本纪》等记录和故事叙述部分中,百济和高句丽灭亡后,还描述此两国的遗族继续努力“收合残民”,策划“复国”大业。然而,金富轼认为,那些国家灭亡的根本原因若是这些国家领导人失去“仁义”的话,则意味着其“复国”也只不过是无法达成的一厢情愿。

(二)与政事相关的概念

接着,在《三国史记》中的历史记述和论赞之中,我们所界定的“政治”(political matters)如何出现?在《三国史记》中,所谓“政治”主要以“政事”和“国事”二词来概括。使用“政事”时,主要表达朝廷制定的“教”“令”,或进行审判的“刑”等比较广泛的意思,故在《三国史记》经常见到“刑政”“政教修明”“政刑赏罚”等用语。而“国事”一词,如“皆许杀身于国事矣”“父子勇于国事”等,还含有和现今所谓“外交”相近的意思,而此“外交”更含有对外战争之意义。

从通史的角度来看,朝鲜古代三国时期最重要的“国事”应该为“祭祀”和“巡狩”两事。其中“祭祀”是向天地神灵以及祖先的灵魂,祈求“无灾害外寇”和“五谷丰饶”,以期达成国泰民安之行为;“巡狩”则是君主离开宫廷而外出视察地方或边疆的政治型态^③。构成《三国史记》记载内容的原始史料中,最重要的“国事”也应该是“祭祀”和“巡狩”两事。换言之,广义的“政事”原本应该隶属“祭祀”和“巡狩”的准备动作或程序性作为。然而,若我们稍微注意历史记录中对“国事”内容的嬗变,则发现“国事”的主要对象似乎从天帝或鬼神变成“人”。而且,在金富轼生活的高丽王朝中期,“政事”的主要内容属于治理人民之事。到此,祭祀和战争总是被视为和“政事”同等重要的国家大事,而相对地,“祭祀”和“巡狩”本身的角色则下降为实践“政事”的手段。无论如何,在《三国史记》的上代记事中,以鬼神为对象的“祭祀”、对“外势”的防备,以及以确认领土为目的之“巡狩”等含有比较丰富的古代思想。但对于以人民为对象的“政事”,古代人肯定其重要性的程度则是可待商榷的。相形之下,达成人民的福利为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目标之一,而以金富轼为核心的《三国史记》之编辑人应该都属于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是故,《三国史记》中有关“政事”原属三国时代的记录,有可能从以神人关系为主的记录,转换成由金富轼等的儒家立场,并以“统治者—被统治者关系”(人人关系)为主作叙述^④。

① 《国语·晋语六》中的范文子之语。

②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佐藤将之:《朝鲜正史〈三国史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概念架构》,《科学·经济·社会》2022年第4期,第81-108页。

③ 申滢植认为,在《三国史记》中“巡狩”的相关词语有“巡守”“狩猎”“田”“巡”“幸”“巡幸”等。参申滢植:《三国史记研究》,首尔:一潮阁1981年版,第172页。

④ 在古代历史记录“改变”的过程通常会有:1)在发生的事件和事件之间加上有关(能说明其)因果关系的叙述或说明;2)“被记载的人物的发言”(此发言内容通常代表后代搜集这些历史故事的作者或编辑人);3)对事件本身的评语,如金富轼的“论赞”等。

二、《三国史记》政治记事的多层结构

假设我们在前节最后提出的论点属实,则可暗示现本《三国史记》的内容应该经过几次不同思想立场的史官或编纂人之手而最终形成。至于在《三国史记》叙述与政事相关的内容,确实似可分为由高丽初期史官之观点主导所统整的内容,以及由金富弼之观点主导所统整的内容两个部分。其中,正如“论赞”所展开的主张和理路,金富弼本人所推展的观点与儒家价值一致,只要我们在其记载找出强调儒家价值之内容,那个地方应该至少是受到金富弼的肯定或认定的内容。那么,代表高丽初期的史官观点的部分应如何找出来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笔者在下文先按照主导《三国史记》记载内容的术语、主张内容,以及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说明等,试图将《三国史记》分成三个部分:依据(至少记录者相信的)史实记录部分、经过谶纬学说修改的部分、在《三国史记》最后编辑阶段可能为了配合金富弼的儒家思想而经过修改的部分。接着,笔者藉由分析在叙述中重视“灾异”和“天意”等部分,以及主张儒家德目的部分的思想多层性,推论这些部分可能是原来高丽初期史官按照谶纬学说来展开历史叙述的内容。金富弼在编纂《三国史记》时,由他信奉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以“仁义思想”——就是其当时国君和主要朝臣是否具有或实践“仁义”这一点——证实从三国时期到高丽时期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三国史记》的思想多层性本身就告诉我们,《三国史记》的思想经过了“以祭祀和巡狩为中心的古代政治”→“以谶纬思想来说明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过程为儒家理念的呈现”的转变过程。

(一) 依据史实的记录部分

《三国史记》的内容跨越千年之久。不可讳言,在这一千年间三国经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型态亦处于变化中。不难想象,从现在的视角,只靠《三国史记》一部文献的内容,对三国时代实际发生过的政治事件及其背后的思想等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将是相当艰巨的工作。我们先不妨参考申滢植曾针对《三国史记》政治记事进行的分析,来理解《三国史记》记载中属于“原始资料”部分所反映的朝鲜古代政治特色。申滢植的研究将构成《三国史记》的三部《本纪》政治记事分类为五个范畴,并进行比较探析。申先生所分类的五种为:A)宫城的建筑、修葺;B)巡狩;C)官吏的任命以及国家制度的整备;D)对天地和宗庙的祭祀;E)其他。接着,申滢植把(E)视为一般政治记事,再细分成七个部分:1)大赦;2)劝农,赈济;3)征服、镇压叛乱;4)阅兵、对外族的防备;5)一般政治;6)关于死亡的论述;7)其他。按照申滢植的整理,(D)“祭祀”是最重要的;而(A)“宫城”的建筑也以祭祀的举行为其重要契机,(D)和(A)是与“祭祀”息息相关的。同时“B”就是“巡狩”。这三类事件共同构成了三国上代记事的骨干。

关于与“祭祀”相关的记载,《新罗本纪》包含不少文武王和神文王的祭文^①。这个情况告诉我们,祭祀在当时应是非同小可的国家大事。先从新罗王的上代记事来看,君主在即位后第二年的“春二月”,就得“亲祀始祖庙”。此外,在“不雨”或“蝗害谷”时,君主必须“禳祀祖庙

^① 在统一新罗时期的史官也应该意识到《左传》“成公十三年条”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句。

及名山”或“遍祭山川,以祈禳之”。《高句丽本纪》亦有关于新帝即位而“祀始祖庙”的记述。不过在《百济本纪》中,几乎没有新帝即位后进行祭祀的纪录,只有君主“祈东明庙”,以求避免自然灾害的相关记事。这个情况当然不代表百济忽视祭祀,它其实反映了《百济本纪》的原始纪录不幸亡佚的现象。从《三国史记》的整体叙述来看,缺乏祭祀纪录的君主并不在少数。这就传达了一个事实:学者在编辑《旧三国史》时,相关的祭祀纪录应该早已散失了。

相比之下,《三国史记》载有较多关于筑城、修宫以及巡狩的记事。特别是筑城的记事,在《百济本纪》中非常突出。由于这个特色,申滢植主张百济很早便专注于防御外敌的军事措施,从而将百济定位为集中国力防御外敌的防御型国家^①。

接着讨论修筑宫阙的记事。修筑华丽宫室的目的,在于彰显王权的“威重”和“崇高之势”,从而“尽发国人”。由于大兴土木必须消耗国力,所以在《三国史记》中,也含有君主坚持修筑宫室和朝臣关心百姓负担之间的争论之记事。不过,在《新罗本纪》“文武王十九年二月”条中,却只有“重修宫阙,颇极壮丽”的记述,而没有录下任何辩论。文武王时代正值对唐战争的关键时刻,而且在遗敕上,文武王自己也说“丧制度,务从俭约”。战事频繁的背景加上遗敕的说法,似乎和“重修宫阙,颇极壮丽”构成了矛盾。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相反的叙述态度呢?依笔者来看《三国史记》的编者(高丽王朝的史官)可能认为在文武王建筑“壮丽”宫阙一事上不需要提及是否被臣下责难过的内容,理由在于:文武王不仅完成了统一三国的大业,而且在他驾崩之前,国家仍然处于和平稳定的轨道^②。相对来说,有争论纪录的君主如高句丽的烽上王^③和百济的盖鹵王^④,则往往是被臣下所弑的暴君。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观对《三国史记》的叙述实有若干影响。相反地,在《新罗本纪》“味邹尼师今十五年条”中,却找到“臣寮请改作宫室,上重劳人,不从”的纪录。但新罗上代其实很少反对建筑宫阙的记事。因此,这一条很可能是在传诵味邹尼师今的“贤明”之过程中,后人附加的故事。

① 申滢植:《三国史记研究》,第154页。

② 当时文武王曾为发动“对唐战争”而消耗了不少国力。在国家需要休息的时期,文武王下令“重修宫阙,颇极壮丽”而没有引起臣民的非议,显然是很可疑的。因此,在此没有“臣下责难过”相关内容的事实似乎反映了高丽史官不欲叙述这种情况的编辑态度。

③ 《高句丽本纪》“烽上王九年春正月”条的记述如下:

八月,王发国内男女年十五已上,修理宫室。民乏于食,困于役,因之以流亡。仓助利谏曰:“天灾荐至,年谷不登,黎民失所,壮者流离四方,老幼转乎沟壑,此诚畏天忧民,恐惧修省之时也。大王曾是不思,驱饥饿之人,困木石之役,甚乖为民父母之意。而况比邻有强梗之敌,若乘吾弊以来,其如社稷生民何?愿大王熟计之。”王愠曰:“君者,百姓之所瞻望也。宫室不壮丽,无以示威重。今国相盖欲谤寡人,以干百姓之誉也。”助利曰:“君不恤民,非仁也;臣不谏君,非忠也。臣既承乏国相,不敢不言,岂敢干誉乎?”王笑曰:“国相欲为百姓死耶?冀无后复言。”

④ 《百济本纪》“盖鹵王二十一年秋九月”条的记述如下:

先是高句丽长寿王,阴谋百济,求可以间谍于彼者。时浮屠道琳应募曰:“愚僧既不能知道,思有以报国恩。愿大王不以臣不肖,指使之,期不辱命。”王悦,密使谕百济。于是道琳佯逃罪,奔入百济。时百济王近盖婁好博弈。道琳诣王门,告曰:“臣少而学碁,颇入妙,愿有闻于左右。”王召入对碁,果国手也。遂尊之,为上客,甚亲昵之,恨相见之晚。道琳一日侍坐,从容曰:“臣异国人也,上不我疎外,恩私甚渥,而惟一技之是效,未尝有分毫之益。今愿献一言,不知上意如何耳。”王曰:“第言之,若有利于国,此所望于师也。”道琳曰:“大王之国,四方皆山丘河海,是天设之险,非人为之形也。是以四邻之国,莫敢有觊心,但愿奉事之不暇。则王当以崇高之势,富有之业,疎人之视听,而城郭不葺,宫室不修。先王之骸骨,权攒于露地,百姓之屋庐,屡坏于河流,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王曰:“诺!吾将为之。”于是尽发国人,蒸土筑城,即于其内,作宫楼阁台榭,无不壮丽。又取大石于郁里河,作棹以葬父骨,缘河树堰,自蛇城之东,至崇山之北。是以仓庾虚竭,人民穷困,邦之隍机,甚于累卵。

在这一脉络上,我们也可以分析关于“巡狩”的记事。如前所示,“巡狩”是君主离开宫廷而视察地方或边疆的政治型态,春秋以前称为“省”,或者说,“省”是“巡狩”的原型。小仓芳彦对于“省”的说明如下:

进行“省”,必定要在场所之间进行移动:王透过场所的移动来确立其在地方的权威。王在从事“省”这种活动时,若对方恭敬而顺从,就用和平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权威;但若对方不顺从,则有可能发动战争。以财货为主的“贡”就是君主赖以展示权威而允准的一种关系——意即,“贡”是指君主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而允许对方纳贡。为了接受贡品,君主本人(或君主的代理人)会主动地驾临对方的领土。^①

按照小仓的见解,“省”的目的是:第一,君主确认其对于周边政治势力的支配权;第二,催促纳贡;第三,透过狩猎的军事训练而确立军事统率权。可以说,在三国时代初期,“巡狩”的原始型态和中国古代的“省”相当类似。由此看来,立国甚久的高句丽,很可能早就进行过具有上述三项要素的“省”。相形之下,立国相对较晚的百济和新罗,在其开国之初,应当是马韩和高句丽催促纳贡而“巡狩”的对象。

现在考察《三国史记》关于“巡狩”的记事。首先,每部本纪第一次出现“巡狩”的记事分别是:《新罗本纪》“赫居世居西干十七年”条;《高句丽本纪》“始祖东明圣王一年”条;《百济本纪》“始祖温祚王五年十月”条。从中可见,三国关于“巡狩”的记事都是从建国始祖的治世就开始的。在《三国史记》中,高句丽和百济的“巡狩”记事(高句丽的巡狩以狩猎和祭祀为主,百济的巡狩以田猎和筑城为主),都能够保存原始资料的原貌。而以视察民情为目的之“巡狩”记事,则始于上代尼师今时代的《新罗本纪》,只是《新罗本纪》的上代记事只记载君主“东巡”(“助賁尼师今六年春正月”条)。《新罗本纪》所叙述的“巡狩”,不仅指出了巡狩的事实,也指出了巡狩的目的。法兴王十一年和真兴王十六年各有一则巡狩的记事,这两次巡狩都是为了扩张领土和确保领土的拥有权而进行的。假设新罗在开国当时也就开始实行“巡狩”的话,其“巡狩”也应该如小仓所观察的具有与中国古代的“省”相似的特性。

直到三国统一以后,新罗的史官才记上“东巡抚恤”之语。由此可以推测,大概从统一时期之后,在新罗朝臣的意识形态中,“抚恤”渐渐成为新罗王需要举行“东巡”的目的。

与此相关,从6世纪“采民心”所出现的《真兴王巡狩碑》上,也可观察出当时新罗王要“巡狩”的儒家特色——理解人民是否有对统治的不满或埋怨。要注意的是,6世纪对新罗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其实,这个时期的新罗由于领土逐渐扩大,国家制度亦发展,其国家成员之构成超越氏族共同体。因此,新罗国君应该面对如何治理原来没有血缘关系的许多地缘共同体的问题。在这些条件下,儒家思想为新罗统治型态之变化,即较新的国家型态如何建立与人民的关系建立了理论基础。如此,新罗历代国君原来以古代意义来实施的“巡狩”,在6世纪之后,则以“救恤”为其主要目的了。

到此我们还要思考新罗朝廷将原应以“练武”或“示武”为主要目的之“巡狩”,转换成以“救

① 小仓芳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东京:青木书店1970年版,第62-63页。

恤”人民为主要理由的“巡狩”之理由。除了6世纪之后新罗国家制度的整备和领土的扩大以外,则是新罗朝臣从治理人民的观点来思考国君需要“巡狩”的意义。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战争规模之扩大,使新罗朝臣面对扩大兵力和物资动员的正当理由,而在此同时,将国君看作“民之父母”之儒家思想开始在新罗朝臣中发挥意识形态功能。也就是说,在新罗王为“民之父母”的类比思维上,“统治人民”的行为被理解为某种程度推行人民福利的实践。在此思想脉络中,从统一时期的新罗史官到高丽的朝臣主要依据的内容应该是《孟子》主张“巡狩”是为了抚恤人民而进行的部分^①。众所周知,根据《梁惠王下》的记载,统治者举行“巡狩”的理由是: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如此看来,《新罗本纪》对“巡狩”的记事受到《孟子》内容影响之可能性相当高。只是若我们考虑金富轼在其历史叙述中,提倡国君推行“仁义”的部分完全是出于对《孟子》思想的信奉,就不能排除这些记事在《三国史记》最后编纂过程中,经过金富轼按照《孟子》的理念加以修改或甚至被“插入”的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在统一新罗时期的史官中已有接受孟子学说的人。如上所述,刻有“采民心”的《真兴王巡狩碑》是在6世纪建立的,这让我们想象大概从那一时期,新罗王朝渐渐开始具有以儒家思想的理路来说明国君“巡狩”意义之思维。

(二)受到讖纬说影响的历史记录或叙述

笔者曾经厘清过,《三国史记》的内容文献可分成三层:1)“引用记事”;2)“故事”;3)“论赞”^②,而许多叙述内容与金富轼的论赞内容相呼应,经过金富轼儒家思想立场之编修。不过,若我们暂不考虑“故事”部分的思想与“论赞”主张可能呼应的问题,其实很容易能够发现“故事”部分的叙述受到所谓讖纬思想的影响^③。特别在说明涉及战役开始和君主薨逝时,根据讖纬思想的各种叙述就会出现。当思考这个情况的原因时,我们先想到的是,三国时期的史官本来就基于他们的讖纬思想立场,以记录他们所面对的历史事件之可能。不过,所谓历史事件和一些灾异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是后世回顾的。因此,在《三国史记》的叙述中含有非常多反映讖纬思想影响之内容,其可能的原因是,在统整三国时代各种不同历史记载的过程中,信奉讖纬思想的编者对内容加以组织性的扩展,甚或更改其叙述内容。在这一视野下,我们尝试考察《三国史记》中讖纬思想比较浓厚的部分。

首先,在《三国史记》对自然灾害的记事似乎都反映讖纬思想的影响。根据申滢植的分类,《三国史记》中的自然灾害大概有二:一类是星变、云变、不雨、日月之变、天色之变等天灾;一类是像地震、火灾、水变、人变、动物变、杂变(鬼鸣、兵库变、像变)等地变。按照申滢植的统

① 作为一种政治型态的“巡狩”同样源于《孟子》。

② 针对《三国史记》文献构成上的如此思想特质,在笔者的《朝鲜史书〈三国史记〉的文献构成与儒家思想的角色》(《哲学中国》2022年第二辑)一文中将提供较为仔细的探讨。

③ 在当代韩文中所使用的术语为“图讖说”,而此“说”均含有“学说”和“思维方式”两种涵义。只是中文比较多用“讖纬”一词,是故本文也含有使用“讖纬思想”一词来代表韩文的“图讖说”。

计,关于天灾地变的记事竟然占了《三国史记》篇幅的27.4%,即超过四分之一^①。

更特别的是,在《三国史记》对自然灾害的叙述中,自然灾害和人间社会的事件往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此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三国史记》的各个叙述中。值得注意的是,其天灾地变的“记录”,不光是一种记录而已,而多为预告国君驾崩或战争发生,是故有对人间社会发出警告的预告功能。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提问:如上所提及,《三国史记》的编者是否有在谶纬思想的影响下扩展,或甚至窜改了相关历史记录之可能?《三国史记》的某一些“作者”是否可能有藉从谶纬思想的角度重写关于天灾地变的每个记录,来重构整部《三国史记》内容之意图?譬如,《三国史记》的编者努力找出某一件历史事件和在此之前发生的自然世界异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将整体内容按照“天变地异→重大历史事件”的架构重述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之始末。在此意义上可以肯定,《三国史记》的内容中确实含有申滢植所指出的“自然和人间相应”的思维^②。简言之,《三国史记》在撰写或编辑的某一个阶段中应该曾被具有这种思维的编者重述过。倘若现今我们手上的《三国史记》文本经过具有谶纬说思想的编者来重述的话,此部分的内容与《三国史记》另一个核心主张——“仁义”——如何关联?这个问题会涉及如何我们理解《三国史记》文献和思想之重要特质,我们在下文再详论。

(三)包含仁义思想的叙述部分

笔者在前文《朝鲜正史〈三国史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概念架构》中阐述,在《三国史记》中所出现十种儒家德目中,“仁”和“义”占其核心价值的情况。譬如说,《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盖鹵王总论”部分宣称“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一句,在此,金富轼藉由针对盖鹵王的总评大力主张,实践“仁义”与否就是能评断某个国君是否具备君德之标准^③。如此,金富轼最关心的一点是在历史记录上,是否能观察出一个国君真正实行过仁政,而他对“仁义”的重视来自于《孟子》的“仁义”论。由于金富轼坚信“仁义”就是支配国家兴亡的铁则,所以现本《三国史记》在对于某件历史事件成败、某个国君作为之善恶、三国兴亡的因果关系,以及高丽能继承新罗之理由等问题中,金富轼不仅在“论赞”中以儒家理念来评断,而且在《三国史记》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尤其是历史事件过程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中基本上都以“仁义”论立场进行润饰或修改。简言之,对金富轼而言,国君具备“仁义”的行为必将获得成果,一国若拥有“仁义”的国君也必将安康且繁荣^④。

到此,我们必然碰到一个问题。现本《三国史记》的论述可分类为“史实记录”“故事式叙

① 申滢植:《三国史记研究》,第184页。另外,东亚灾异历史的专家小林健彦在近年的一系列研究中针对《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的灾异记录进行相当详细的探讨。由于小林对这问题的论考并不少,笔者其中只举一篇。请参阅小林健彦:《高句麗本紀に見る災害対処の言語文化:太祖大王期以降を中心として》(《在〈高句麗本紀〉所看见的应对灾害之言语文化:以太祖大王期以降为中心》),载《新潟縣産業大學經濟學部紀要》2019年第52号,第23-71页。

② 申滢植:《三国史记研究》,第17页。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主张在《三国史记研究》一书中反复出现。

③ 到此也无妨整理更广阔的《三国史记》之政治观。在“仁义”的实践上,《三国史记》的作者或编者们也重视作为实现“仁政”的方法之“尚贤”。

④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例证,请参阅佐藤将之:《朝鲜正史〈三国史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概念架构》(《科学·经济·社会》2022年第4期,第81-108页)的相关论述。

述”^①以及“论赞”之三部分,其中“故事式叙述”可再分成如下三种:“由编者对历史记录中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说明”,“原来以口述的方式流传的‘故事’由编者放在史书中的叙述部分”,以及“抄写当时已经存在的文献(中国史书等)的内容”。“故事式叙述”的内容常常成为历史故事“叙述者”用来“证明”他们历史观和思想立场的“著作实验”场所,而值得注意的是,现本《三国史记》“故事式叙述”部分的内容包含着与“论赞”评断互相对应的主张。既然“论赞”的内容贯通《孟子》的“仁义”思想,就意味着在《三国史记》中“故事式叙述”含有讖纬思想和《孟子》“仁义”论的两种思想。若是如此,我们应如何思考在《三国史记》“故事式叙述”部分中讖纬思想和《孟子》“仁义”论这两种彼此格格不入的主张共存的情况呢?这暗示《三国史记》的历史记载到其完成,应该经过由两种不同思想立场的编者重述、扩展或更改的过程。简言之,其历史记述含有两层思想结构。那么,若此情况属实,问题就在于“故事式叙述”部分的思想中较能支配其内容主轴的,应是讖纬思想还是金富轼所信奉的“仁义”思想?有鉴于此,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在《三国史记》论述中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中哪一种思想占其论述或整体思想立场的“主轴”及其理由。

三、《三国史记》思想中讖纬思想和“仁义”论之间的张力： 以历史人物之间的论辩为例

所谓“讖纬思想”预设:在自然世界中发生的“异常”一定影响人间的历史事件。若古代王朝的史官采用此种历史观的话,会按照自然环境主导的观点来进行历史叙述。因此,对古代王朝的史官而言,记录各种天变地异也是不可或缺的任务。众所周知,在《春秋》“经”部分的记载就富有各种天变地异之记录。同样地,在《三国史记》的历史记录中也含有这方面的丰富记载。耐人寻味的是,若我们详细观察中国古代战国时代的文献,如在《春秋左传》《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对某一个历史事件或“天一人”关系的论述中,能发现其作者们对天变地异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其一,认为“天意”必定影响“人事”;其二,若国君“尽人事”(修德),即便有天变地异,也不会导致人间的大灾祸^②。其实,上述文献完成阶段的作者们基本上有接受后者观点的倾向,而这种情况反映出战国时代的天人关系论中儒家的德治论的成分增大。也就是说,战国中期之后的思想家相信,一个国君要不要修德才是“天变地异”是否导致人事福祸的关键^③。与此相比,虽然《三国史记》的历史记录中所谓讖纬思想和中国先秦时期的“天人”观相较,可能与中国古代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但我们在《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述中确实能观察出与战国思想文献相当类似的“天意”和“人事”之间思想张力的情形。

① 其中“史实记录”和“故事式叙述”在《春秋左传》中也观察出。更准确的说,《三国史记》内容的(属于统一新罗时期之后的)作者和编者应该仿效过《左传》的记述方式。

② 关于战国时代的思想在历史说明中要重视“天意”还是“人事”之间的紧张关系,请看佐藤将之:《后周鲁时代的天下秩序:〈荀子〉和〈吕氏春秋〉政治哲学之比较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1年版,第175-186页。

③ 不可讳言,《荀子》所谓“天人之分”的主张也在此战国时代的思想脉络中:《荀子》认为,只要人君要修德,至少天变地异对人事的负面影响力相当有限,或只不过是一时性的。

今本《三国史记》的作者们在描述历史事件和说明其始末时，一个国君在听从“天意”和坚持儒家价值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张力，而这种思想张力，经常出现在不同立场人物针对某一个故事进行的争论中。首先我们观察《金庾信列传》中“引述”的金庾信(595-673)的发言。笔者认为，这段内容藉金庾信之口来呈现相信“迷信”的新罗朝臣和“儒者”金庾信的合理主义之间的对立格局，实为突显在高丽时期流行的谶纬思维和金富轼的儒家德治论之间的对立。《金庾信列传》写道：

丙夜，大星落于月城。毗昙等谓士卒曰：“吾闻落星之下，必有流血，此殆女主败绩衄之兆也。”士卒呼吼声振天地。大王闻之，恐惧失次。庾信见王曰：“吉凶无常，惟人所召。故纣以赤雀亡，鲁以获麟衰，高宗以雉雄兴，郑公以龙鬬昌。故知德胜于妖，则星辰变异，不足畏也，请王勿忧。”……曰：“天道，则阳刚而阴柔；人道，则君尊而臣卑。苟或易之，即为大乱。今毗昙等以臣而谋君，自下而犯上，此所谓乱臣贼子，人神所同疾，天地所不容。今天若无意于此，而反见星怪于王城，此臣之所疑惑而不喻者也。惟天之威，从人之欲，善善恶恶，无作神羞。”^①

如上所述，引文应当被理解为金富轼借金庾信之口宣传他自己的理想。笔者之所以能判定此发言不能看作是金庾信发言的真正历史记录，是因为如下三个理由：

第一，在引文中，金庾信的发言涉及不少中国文献中的史料和儒家价值，但在金庾信的时代，即便他的身份能阅览到中国典籍，但如当时中国王朝的博士般以“纣以……，鲁以……，高宗以……，郑公以……”这样纵横引述中国典籍的方式来展开论述，并不像三国时代实际所为，而是已充分消化儒家古典的知识分子之经典内容。

第二，引文“天道，则阳刚而阴柔；人道，则君尊而臣卑”中“天一人”世界分开的思维似乎反映所谓“天人之分”的思想。这句话的内容来源于《荀子·天论》的相关论述，而由于如引文般的主张在上列战国文献中屡次出现，我们也不需要特别把此主张与《荀子》的“天人之分”主张连起来，但我们合理怀疑身处7世纪新罗的金庾信是否能够清楚地根据“天人之间的角色分开”观点展开自己的政见。其实，这一点也会引出下列第三点。

第三，金庾信的发言对象是真德女王(?-654)，而从古代王权的存在情况来说，真德女王应该就是一位具有巫觋性格的女王，这样一位女王最重要功能就在于非听取天意莫属。因此，当时新罗人的世界观下，毗昙等所言的“落星之下，必有流血”应该比较符合当时新罗朝臣解释“落星”情况的方向，而面对这样的时代精神，金庾信发言中单凭儒家价值观的说法，应该难以打动真德女王和新罗朝臣。

根据如上所述，倘若我们可以将这一段金庾信主张看作代言金富轼思想的话，那么其具有何种思想意义呢？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金富轼当时的新罗历史年代记录(可能是高丽初期编纂的所谓《旧三国记》，下文再论)中应该还保留着善德女王治世时的“落星”记录。不可讳言，假设“落星”系指“陨石冲撞到地上”，在新罗时期也好，在高丽时期早中期也好，这样“落石”事件的发生(观察到在冲撞时的闪火和巨大爆炸等)，就当时的时代精神而言，所指

①《勘校三国史记》，民族文化推进会1982年修正版。

示的应该是非常负面的天意呈现,甚至是“国君即将驾崩”等情况。然而,因为金富弼所入手的新罗历史年代记录含有针对“落星”的记载应如《春秋》“经文”般简短,所以他把原来即使“简短”但也负面的天变地异相关的记载,转换成宣扬儒家理想的论说文段。此文段的主角就是金庾信,而他是从统一新罗时期直到高丽时期都极受推崇的政治人物。在文段中,金庾信被叙述为面对主上展开相当长幅谏言的“儒臣”。笔者认为,在构成如此复杂思想内容的“历史叙述”之背后,一定存在着现本《三国史记》编者——金富弼——的明确意图:金富弼针对在真德女王治世有“落星”的历史记载,藉由金庾信大力喊出“故知德胜于妖,则星辰变异,不足畏也”,而提出“天一人”之间的角色要分开的主张,让故事中的金庾信变成理想的“儒臣”,即便他面对“落星”那样重大天变地异,还能喊出“不足畏”。这样,金富弼提出“金庾信曾经也依据儒家思想来抗衡要盲从天意的新罗王”的主张,亦透过历史叙述方法使“儒臣金庾信”诞生。按照金富弼的理路,儒家理念是从新罗时期起贤臣所拥戴的普遍价值,应该取代高丽王朝中期还相当盛行的谶纬思维^①。

接着,我们考察另一例子。这就是在《新罗本纪》“敬顺王九年十月”条中新罗末代君主敬顺王(?-978)和太子之间的争论。编辑该文段的金富弼同样以借用敬顺王之口来否定“天命”对“人事”的权威。《新罗本纪》写道:

王以四方土地,尽为他有,国弱勢孤,不能自安,乃与群下谋,举土降太祖。群臣之议,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王子曰:“国之存亡,必有天命,只合与忠臣义士,收合民心,自固力尽而后已,岂宜以一千社稷,一旦轻以与人?”王曰:“孤危若此,势不能全。既不能强,又不能弱,至使无辜之民,肝脑涂地,吾所不能忍也。”乃使侍郎金封休,赍书请降于太祖。王子哭泣辞王,径归皆骨山。倚岩为屋,麻衣草食,以终其身。^②

在这个段落中,敬顺王和太子之间的论辩架构本身,正好为金富弼提供表达他自己思想的场面。论辩核心议题在于:太子主张天命对国家兴亡之决定性,敬顺王却主张“至使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之不可。敬顺王的这种“保民”的主张是另一种方式的“仁政”之实践。其实,在先秦两汉的儒家文献中,从夏到商或从商到周,对王朝替换的事件之描述往往在实践“仁义”者和违反“仁义”者之间的对立格局下进行。在此格局中金富弼表扬敬顺王的“仁政”之实践是相当自然的事。不过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与“仁政”对立起来的价值是“天命”,而金富弼藉由造出敬顺王根据他的“仁政胜于天命”的立场将统治朝鲜之王权交给高丽王建的故事格局,主张实践“仁义”的价值可以超越跟从“天命”这一点的信念。也就是说,在金富弼的政治哲学中,“仁义”的价值支配历史中的王朝交替。

① 提到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推想,重构“儒臣金庾信”是因为金富弼使用儒家德治论对抗高丽朝臣支持的妙清(?-1135)之谶纬论。妙清,高丽僧人,生年籍贯不详。据传妙清通阴阳之术,以诡诞之说迷惑大众。郑知常等人服其说。高丽臣金安、文公仁等皆尊之为圣人。仁宗亦颇信之,为之建道场。妙清尝请仁宗由上京(今开城)迁都西京(今平壤),因朝臣反对而未成事。仁宗十三年(1135),妙清与赵匡等谋反自立,自称天遣忠义军,国号“大为”,改元“天开”,但妙清本人在金富弼成功平乱之前被杀。

② 《新罗本纪》“敬顺王九年十月”条。

虽然金富弼在描述从新罗到高丽的王朝交替之际,成功提出敬顺王曾经实践过“仁政”并由此克服“天命”的论点,那么,高丽太祖本人的“实践仁义”又如何呢?其实,假设从只是记录事实的高丽王朝史官而言,既然王建已得到“高丽太祖”新王朝创始者的谥号而被崇拜,那他们淡定地叙述历史事件应该就可以。然而,对信奉儒家价值的金富弼而言,叙述新罗到高丽政权移让之际的王建,和金庾信一样,一定要是拥护儒家价值的统治者。换言之,只要他成功叙述太祖王建实践过儒家价值这一点,这等于能够证实继承新罗的高丽王朝就是正统的儒教国家。要达成此目标,金富弼应该碰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在建王的政治生涯中曾有一件并不符合儒家价值的事件发生,这就是王建向他的主上后高句丽王弓裔(?-918)发起叛变。按儒家政治哲学的价值,向主上的叛逆为违反“忠”的行为,绝对是不被容许的。因此,金富弼试图由《孟子》“仁义”论的理路掩盖王建“不忠”的叛变行为。按照金富弼的理路,建王的叛变是为了实践人民的福利不得不排除暴君弓裔。《弓裔列传》即写道:

夏六月,将军弘述、白玉、三能山、卜沙贵,此洪儒、裴玄庆、申崇谦、卜知谦之少名也。四人密谋,夜诣太祖私第,言曰:“今主上,淫刑以逞,杀妻戮子,诛夷臣寮。苍生涂炭,不自聊生。自古废昏立明,天下之大义也。请公行汤、武之事。”太祖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纯自许,今虽暴乱,不敢有二心。夫以臣替君,斯谓革命。予实否德,敢效殷、周之事乎?”诸将曰:“时乎不再来,难遭而易失。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政乱国危,民皆疾视其上如仇讐。今之德望,未有居公之右者。况王昌瑾所得镜文如彼,岂可雌伏,取死独夫之手乎?”夫人柳氏闻诸将之议,乃谓太祖曰:“以仁伐不仁,自古而然。今闻众议,妾犹发愤,况大丈夫乎?今群心忽变,天命有归矣。”手提甲领进太祖,诸将扶卫太祖出门。^①

稍微详细分析此段内容,就会发现此段主要透过“记录”论辩内容的方式展开事件的始末。不可讳言,此论辩的内容应该反映金富弼的思想立场。首先,金富弼相当小心地叙述提出向弓裔叛变想法的人并非王建本人,而是他的四位部下。不但如此,金富弼藉由让王建宣言“吾以忠纯自许,今虽暴乱,不敢有二心”,试图说服读者王建并非“不忠”的人,当初是拒绝要向弓裔引起叛乱的。如此,金富弼藉由将高丽太祖描述为不会违反儒家价值的君王来试图让读者“放心”。不但如此,为了提高身为高丽王朝创立者的正当性,金富弼还提出另一个重要论点——高丽太祖就是《孟子》“仁义”思想的推进者。在为了叛乱谋议的描述中,金富弼竟然让王建之妻柳氏喊出“以仁伐不仁,自古而然!”。到此,读者会被金富弼说服的不但是弓裔为并非适合治理朝鲜的暴君这一点,而且“王建叛逆弓裔”的历史事件也实为王建的《孟子》“革命论”之实践。虽然形式上这一段并非按照金富弼的名义而撰写,但从这一段的内容自然能够看出此段的作者具有强烈的意图要说服读者:弓裔既为暴君,因此王建的目标是藉由“以仁伐不仁”的“革命”来实现《孟子》的“仁义”思想。由此观之,即便这一段的内容并非从头创造的文字,但与其看作高丽史官的历史记录,不如看作一位

①《弓裔列传》卷五十。

儒臣——笔者认为金富弼——要说明高丽王朝的建国为何符合《孟子》“仁义”的理由。

如上三个文段呈现出金富弼试图将儒家价值,特别是《孟子》的“仁义”视为贯通于朝鲜历史,并决定国家兴亡成败的法则。在此法则之下各种“天灾地变”的想象都被看作只不过是“不足畏”的“妖”,甚至连“天命”亦下降为落后于“仁义”的次等价值。金富弼按照《孟子》“革命”论的观点,还提出“仁者”向“不仁”的主上可以叛变之论点。

笔者还欲探讨上述《三国史记》思想多层性如何形成的问题。首先,《三国史记》的“论赞”部分由金富弼本人撰写,而在此内容中完全看不出讖纬思想,可以确定金富弼编纂《三国史记》的阶段,他自己应该不会将讖纬思想的内容加进《三国史记》的叙述。这意味着《三国史记》受到讖纬思想影响的记载应该在金富弼开始编纂《三国史记》之前已在其中。那么,这是否可代表受到讖纬思想影响的年代,记录内容是从三国时代传下来的古老历史记录本身?像如上所提及申滢植的观察,讖纬思想影响渗透于整部《三国史记》的内容。然而,三国时代的史官应该是以个别记录的方式记录事件,所以在现本《三国史记》的内容中,由讖纬思想支配整体三国历史记述的情况与古代史官的撰写方式似乎并不符合。

倘若这样的观察属实,《三国史记》的内容大概在什么时期由讖纬思想来“重构”呢?其实,我们已知悉现本的《三国史记》并非金富弼将三国时代的原史料从头直接合起来编纂,而是根据高丽初期的史官所编纂的所谓《旧三国史》而重构三国历史的文献^①。换言之,在高丽王朝继承新罗对朝鲜全土的统治权后不久,高丽初期的知识分子就按照中国王朝的惯例着手编纂叙述三国到统一新罗时代比较完整的历史书。由于在高丽朝开国之初,讖纬思想已开始流行,而《旧三国史》的撰写应该始于反映这种思想风气,意图将原来从三国时期继承下来的个别历史记录由讖纬思想来编为较为一贯的历史记述。如此,在《旧三国史》的历史说明中讖纬思想像“法则”般发挥其说明历史因果关系的功能。

直到高丽中期,透过对儒家典籍如《论语》《孟子》《春秋》等的理解而形成的知识和价值观渐渐成为高丽朝臣的思想核心。到了金富弼生活的时代,知识分子已意识到儒家德治论和讖纬思想之间的矛盾,特别由于《旧三国史》对历史经纬的说明贯统于讖纬思想,而这样的历史说明无法满足高丽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实践需求,所以他们认为朝鲜的历史应该基于儒家经典所提出的德目之实践与否来展开。金富弼则迎接这种新的思想需求,将推动三国历史的“法则”从讖纬思想转换成《孟子》的“仁义”。这应该是即便当时高丽王朝已具有如《旧三国记》般叙述整段“三国”的历史书,金富弼还要重述三国历史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从现存历史记述的状态来可以推测,金富弼对《三国史记》内容之变更应该以相当慎重的态度来进行。金富弼在“论赞”部分的论述凸显出儒家立场,至少他还是保留着三国年代记录中各种灾异相关的记载本身,而针对历史叙述部分,他努力让故事的经纬尽量向符合“仁义”理念方向“修正”。也就是说,金富弼为了重述新的三国历史,在不删除古人留下的天变地异相关记载的条件下,将其思想重要性加以淡化。

^① 关于在《三国史记》编纂之前,所谓《旧三国记》已存在的事实,有由不少学者的讨论。今只举其中可以用中文参考者,请参阅河炫钢:《〈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之史观》,李凤奎译注,《中兴史学》1995年第2期,第161-181页。

总而言之,从古代政治过程中的王权角色来看三国建国时期的历史情况,正如商朝的“甲骨文”资料所示,建国时期三国的“政事”重点也应该在于理解天意、不违逆天意。三国早期的国君基本上都应该具备巫觋角色,在与天神的沟通之需要上,国君必须慎言慎行^①。同样地,朝鲜三国时代所撰写的历史记载也应该富有“巫觋”性格,也应该重视“天意”。到了高丽开朝,在其初期的思想环境中,则以讖纬思想支配着当时的政治意识型态。因此,在高丽早期所编纂的《旧三国史》的内容也应该反映过这种思想风气,讖纬思维应该渗透于整部历史记载内容中。不过,到了高丽时代中期金富轼重编三国历史文献的时候,高丽朝臣信奉儒家价值的思潮已成形,而金富轼面对的《旧三国史》的主导思想是以“天意”为主的讖纬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思想背景下,他希望以《孟子》“仁义”思想来重构三国历史的来龙去脉。在此金富轼不但强调“仁义”的重要,而且以“仁义”说明国家兴亡时的“法则性”,由此在朝鲜政治思想的历史上,儒家德目“法则性”获得对天意“法则性”的优势。尽管如此,金富轼也并没有完全删除受“讖纬思想”影响的历史记述,只是将说明历史因果关系的转换改为由于“仁义”实践与否而展开历史叙述。此为现本《三国史记》中讖纬思维(讖纬论)和儒家思想两种彼此异质的思想或价值体系共存的理由。

结论

笔者相信,经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本文厘清了《三国史记》的论述内容实为由讖纬思想和仁义论的双层结构,而两种思想并存的事实表明《三国史记》经过高丽王朝初期和金富轼时期这两阶段的编辑过程。

在高丽王朝初期,当时的史官将他们搜集的三国时代有关的历史记录,由他们所信奉的讖纬思想来统整,这样写出来的史书就是后来成为《三国史记》主要原型的《旧三国记》。尔后,直到高丽王朝中期,金富轼重新编纂现本《三国史记》之际,再由他所信奉的《孟子》“仁义”论来重构了三国历史。他特别针对新罗到高丽王朝交替的历史叙述,借高丽太祖王建之幕僚及王建夫人的发言内容,试图把王建叛变主上弓裔的行为视作仁义理想的实践。

就这样,金富轼将《旧三国记》原以灾异等“天意”支配三国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转换成以某一个国君或朝臣是否具有(违反)“仁义”的角度来重述国家兴亡的成败过程。在此,“仁义”这个德目不但被看作高丽统治层最需要实现的政治(和伦理)理想,而且提升为支配太古以来朝鲜历史的法则。

① 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们开始强调“国君必须慎言慎行”本身就具有固有的政治意义。战国时期以来儒家开始关心的是:统治者如何通过实践儒家所强调的德目而符合上天的旨意? 战国时期到西汉的儒家思想中,《周易·系辞传》也好、《礼记·中庸》也好,甚至《孟子》的“王位相继论”也好,都努力将儒家德目和天意互相调和。到了汉朝,董仲舒可能是最典型地追求此种理想的思想家。

Between Heaven's Will in Portentology and Mencian Idea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 Double Layers of Thoughts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 Official Dynastic Record of Korean History

Masayuki Sato

School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17, China
E-mail: msato@ntu.edu.tw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upon the history of ideas approach, aims to elucidat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ought appeared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hereafter, *HRTK*) with close focus upon its argumentative styles in which various ideas and arguments constitute its multi-layers of thoughts. The discussion of this article is proceeded on the following the three sub-topics: (1) By what kind of concepts and terms did the authors (including scribes of Koryo Dynasty and Kim Bu-shik) of *HRTK* understand the state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2) What were the Portentology and Mencian idea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which have become the two main backbones of the content of *HRTK*? And (3) How did these two thoughts influence the textual formation and argumentative structure in i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arguments of *HRTK* are constructed upon the double structure of Portentology and Mencian idea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this kind of textual formation implies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present text of *HRTK* has been made through two steps: the early Koryo Dyasty and that when Kim Bu-shik lived. When Kim Bu-shik recompiled *HRTK*, what he witnessed was the fact that the whole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have been fully penetrated by Portentology in which many historical events were believed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will of heaven with natural disasters and unusual phenomena. Kim Bu-shik has transformed such an argumentative frame work into another one in which the rise and fall of all the countries were decided by whether those rulers practiced the Mencian idea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or not. Here, the virtue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were indeed not only one of the cardinal moral values for Korean intellectuals onward, but also were considered to be the rule that would dominate the Korean dynastic history from the past to the future.

Keyword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Kim Bu-shik; Mencius; ideas of *ren* (benevolence) and *yi* (righteousness); Koryo dynasty; portentology; Korean 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 张晓梅)